

科普或公共寫作： 芭樂、巷仔口／公共、柑仔店、菜市場 和爆米花的知識傳播

張時健*、陳慧蓉**

摘要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知識推廣工作，通常以「科普」稱之。然而，人文社會學者的知識傳播不僅在於讓一般大眾能接收並理解學院中的知識，更是一種積極介入公共議題的書寫實踐。負責推動本次論壇的臺灣傳播學會祕書處，以科普或知識份子的公共書寫作為思考框架，邀請《芭樂人類學》、《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以及《爆米花傳播學》的編輯，分享在各自學門的知識傳播經驗。

關鍵詞：科普、公共書寫、知識社會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傳播

* 張時健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scchang@ccu.edu.tw

** 陳慧蓉 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hc8677@yahoo.com

Making Knowledge Popular or Public: Practices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in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ih-Chien Chang & Huey-Rong Chen*

Abstract

Knowledge promo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in civil society has traditionally been framed as a for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owever, beyond merely providing citizens with access to academic knowledge, communicators increasingly aim to foster more active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this forum, the Secretariat of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presen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delineate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s' public writing. Professional editors from knowledge-communication blogs in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been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reflect on the practices of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Keywords: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writing,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 **Shih-Chien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He also serves a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as its Vice-Secretary-General.

Huey-Rong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She is also the council member of Taiw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論壇緣起：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傳播怎麼做？

臺灣傳播學會推出的《傳播學爆米花》已經運作三年，是傳播學界面向社會大眾推廣學門知識的重要園地。該刊物透過淺顯易懂的短文介紹研究新知，並探討公共議題，在持續耕耘之餘，也嘗試了多項探索性的安排。在《傳播學爆米花》之前，臺灣社會學會經營《巷仔口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在人文社會學門的知識傳播上扮演先行者角色，十數年來累積了豐富經驗；然而，隨著傳播環境的變遷，也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因此，在 2025 年 6 月的臺灣傳播年會上，兩學門學會合作舉辦專場座談，探討人文社會學科公共知識的傳播方式；會後持續推進，並邀請《芭樂人類學》、《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等知識傳播工作的主責學者接受專訪，分享實務經驗；同時，於 2025 年 11 月的臺灣社會學年會專場座談中，再度邀集各學門學者參與討論與意見交流。臺灣傳播學會秘書處整理了半年以來的工作成果，包括各學門編輯的訪談文字紀錄，以及在此過程中累積與參考的思路框架，並於學刊論壇上呈現。期盼此整理不僅能對往後人文社會學門的知識推廣提供參考，也能回應公共知識傳播行動者的反身性問題：怎麼做，以及為什麼。

科普與新知傳播

科學知識的普及（科普）旨在讓公眾更容易接近並理解科學知識，從而提升整體的科學素養。此一工作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幾乎是不證自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長期負責在國際層面推動科學教育與知識普及，並於 2000 年發布具有規範性意義的《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宣言》。在這份宣言中，UNESCO 清楚闡述了科學知識應如何被共享與運用的原則（Cetto, 2000, p. 464）：

科學教育應以普遍與各種形式推廣，這對民主社會不可或缺，也保障了人類的永續發展。…有必要在社會的各文化與階層全面發展提

升科學素養，使公眾具備推理的能力與技術，還能理解有關的倫理價值，從而能在應用新知的有關決策中積極參與。科學的發展突顯了大學的重要角色，特別在科學的教學現代化與推廣，以及將之與各教育階段整合上，特別重要。…

這個科普定義提醒我們：當代民主社會的運作建立在公眾參與的基礎上；而集體公眾參與的有效性，應依賴個別公民具備運用科學知識進行理性思考的能力。此外，公眾的科學素養亦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Fourez, 1997）。然而，若反向思考：沒有科學知識的個人是否仍能參與當代民主社會的運作與集體決策？根據普遍公民權的原則，答案應為肯定。但個別公民所具備的科學知識多寡，是否會影響其政治參與程度或公民權的行使？例如，具有充分科學知識的專家是否被允許參與更多公共決策，或行使更大的權利？進一步的後設問題則是：什麼樣的社會體系需要其公民具備科學知識才能運作？這類批判性延伸還可追問：什麼是科學？誰的科學？非科學、偽科學或不科學的言說，以及非理性行動，是否會被社會認可或採納？

這些問題源自對論述合法性（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的反思（Van Leeuwen, 2007）：前述 UNESCO 對科普的陳述，可能暗示了基於科學知識、科學程序或科學理性的論述，在現代社會中被視為更具價值（valuable）。發言者因慣例與制度化安排而被賦予權威（authority），例如高等教育單位的研究者；而社會行動因這些言論的支持，被認為能促進整體社會目標，因此此類言論被認定為理性（rational，即具因果關係並可預測與控制），例如推廣科學知識與其應用對社會發展有益。在這一結構中，具備科學知識或能有效運用科學論述者會受到獎賞（rewarded），而未能具備或運用者則可能受限制，例如具備科學知識的人能獲得更多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前述科普的定義隱含了科學所帶的權力，以及科學作為政治聲稱的角色。

這種以促進社會發展為本的科普思考，在傳播研究傳統中曾集中於創新傳播（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知識落差（knowledge gap）以及近年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等議題。相關研究者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科學知識的推廣應如何有效？公眾的採納過程又是如何進行的？特別是在新觀念推廣（如破除迷信）、新科技應用（如農業技術改良）、公共衛生或現代醫學知識普及（如防疫期間的個人衛生策略）等

領域，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畢生投入此主題研究並提出創新採用五階段理論的 E. M. Rogers，對美國國際援助計畫以及前述 UNESCO 的國際科學傳播工作均具有深遠影響。在 Rogers 的理論框架下，公眾在面對創新技術或新知時會感到不確定（uncertainty）：在缺乏資訊或無法預期結果的情況下，本能地對採用未知概念或技術感到疑懼，擔心可能帶來不可預測的結果。而創新的傳播過程正是透過提供更多相關資訊給接收者，降低其不確定性，並協助其在因果判斷與後續行動選擇上提高可預期性（Rogers, 2003, pp. 5-7）。

這樣以促進社會發展為目標的科普觀點，在傳播研究傳統中，曾於「創新傳佈」（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知識落差」（knowledge gap），以及較近年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等主題下獲得集中討論。相關研究者關注的核心問題包括：科學知識要如何被有效推廣？公眾在採納新知的過程中經歷了什麼？特別是在新觀念推廣（如破除迷信）、新科技應用（如農業技術改良）、公共衛生或現代醫學觀念的普及（如防疫時期的個人衛生策略）等領域，累積了豐富研究成果。終身致力於此領域並提出「創新接受五階段論」的 E. M. Rogers，其研究不僅深刻影響美國的國際援助計畫，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前述 UNESCO 的國際科學傳播思維。在 Rogers 的理論架構中，公眾面對創新技術或新知時往往產生不確定感（uncertainty）。在資訊不足、結果不可預期的情況下，人們本能地對採用新的概念或技術所可能帶來的未知後果感到疑懼。傳佈的過程，因而被理解為提供接收者更多相關資訊，以降低其不確定性，協助其在因果判斷與行動選擇上提高可預測性（Rogers, 2003, pp. 5-7）。

公共書寫與對話溝通： 時空脈絡下連結他者的改變行動

Rogers 晚年對創新傳播理論的反思，在社會學與政治學領域中有更直接的回響。王宏仁在〈社會學的公共書寫：以學術科普部落格為

例〉(2016)這篇於其擔任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期間所發表的年會演講稿中，開宗明義便提出馬克思所強調的「改變世界」與 Michael Burawoy 所主張的在不平等世界中「積極介入」(engage)是社會學家的責任 (Burawoy, 2015, 引用自王宏仁, 2016)。他據此說明《巷子口社會學》創刊的初衷：「……社會學的公共書寫，或巷子口社會學部落格，傳遞的不僅是社會學知識，也是一種熱望——一種基於社會責任、致力推動社會改變的熱望！」(王宏仁, 2016)。

這使得含有命題性與時代迫切性 (exigency) 的公共書寫 (public writing)，相較於科普 (popular science) 中對學科知識的介紹與轉譯，呈現出更強的關係性 (relational) 與本體論 (ontological) 內涵：學科的公共書寫成為學者／作者透過其知識訓練回應時代議題的方式，重新建立自己與公眾的關係，並期待發表與讀者之間的迴響，以形成促進改變的能動性。更進一步，公共書寫的目的性也促使寫作者調整自身的發言位置，從「學者」(the academia) 轉向與公眾進行更平等對話的「學術公民」(academic citizen)，將學院內的研究應用於社群實務與公民行動之中，進而帶來正向改變 (Holmes, 2022)，並使其與公眾的對話更具意識性與計畫性，從而創造出可促進社會正向變革的溝通行動。

公共書寫因此除了承載熱情，也是一種有計畫的脈絡性寫作。在 Ashley Holmes (2022) 對公共書寫的分析與教學實踐中，這種脈絡性計畫被用來創造「公共修辭情境」(public rhetorical situation)：即選擇適時且相關的議題，並期待書寫的流通、發行及出版能連結至有助於改變的公眾或對抗公眾 (counter-publics)。公共書寫要求與讀者建立實質聯繫，而非單向說服或僅「向民眾解釋專業知識」，其核心在於透過書寫與讀者建立關係。在對話研究中，這種發聲-他者的關係建立被視為一種傳播倫理的關懷。Martin Buber (1958) 在其著作 *I and Thou* 中指出，人類語言的核心詞彙——「我-你 (thou)」或「我-它 (it)」——正反映了人類關係的模式。對話研究中，Bakhtin (1981) 對眾聲喧嘩 (heteroglossia) 的討論，以及巴西教育學家 Paulo Freire (1972, 1974) 在《改變教育》中對對話性辯證 (dialectic) 的探討，都關注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這對對話行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而這種溝通倫理的實踐，必須建立在文字意義的時空脈絡限制之

上。Bakhtin 與 Freire 均認為，文字的意義是時間與空間情境下的產物。在 Bakhtin (1981) 的對話主義 (dialogism) 中，這個時空脈絡被稱為「事件」(event)；在 Freire 的理論中，則被稱為「情境」(situation)。Holmes (2022) 在其公共書寫教學中，將意義與議題的生成實踐於「地點書寫」(writing on location)，即透過選擇特定的公共空間進行書寫，從而使有關該空間的議題與意義得以生成。類似的概念亦可在法國哲學家 Alain Badiou 的理論中找到，如場址 (site)、事件場址 (evental site) 或因有死而生之處 (mortal site) (Badiou, 2005)。對 Badiou 而言，事件發生之地是批判意識與辯證力量的生成之處，人與書寫或報導活動因而在此匯聚，產生辯證性的批判意識。以太陽花運動為例所催生的《菜市場政治學》，正是這種脈絡的具體表現。同樣地，鑲嵌於時代之中的《芭樂人類學》、《巷仔口社會學／公共社會學》以及《歷史學柑仔店》，雖強弱各異，亦呈現出類似的時空脈絡與他者連結的身影。

出乎對話溝通或是公共書寫理論所討論與意料，是台灣的公共知識寫作所意欲連結的，除了學院之外的公眾，也有學術領域圈內的眾同儕。不論是志在科普或是邊緣戰鬥的公共書寫，《傳播學爆米花》及《芭樂人類學》都期待藉由其刊物的共筆及接力寫作，可以增進學門內的情感及凝聚力。「培養情感」的期待除了隱約指出學門內的異質性，也是透過公共書寫達到對話連結的雙向進行：能夠調整自身發言位置與公眾連結的學者們，是否更能以「學術公民」的身份產生同志情誼？

科普與（或）公共書寫：一個理解的框架

根據前述兩小節的簡要分類，我們可以初步理解，對於掌握科學方法與程序以獲取知識的專家而言，科普 (popular science) 是向公眾分享已有知識權力的行為，即從學院的位置出發向公眾傳播知識；而公共書寫 (public writing) 則是與公眾協商知識有效性的行動，是走出學院、邀請公眾參與辯證性發展的過程。

基於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向度理解非學術規格的知識論述：一是

知識所有者的場域——學院場域與公民場域（academic's sphere vs. citizen's sphere）；二是知識傳播的行動方向——知識傳散與知識協商（knowledge dissemination vs. knowledge negotiation）。由此可構成四種類型：

- (a) 在學院場域進行知識傳散：以學院同儕為受眾，發佈與知識相關的論述，例如非學期期刊的學門簡訊；
- (b) 在公民場域進行知識傳散：以非學院內的公眾為受眾，發佈知識相關論述，例如科普主題的大眾媒體；
- (c) 在學院場域進行知識協商：以學院同儕為受眾，提交知識論述並邀請回應；
- (d) 在公民場域進行知識協商：以公民為受眾，提交知識論述並邀請回應，例如公共書寫。

就科學知識的特性而言，自然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知識傳播較多呈現類型 (a) 與 (b)；而人文社會學科則較常見於四種類型皆有分布，但在本次專題邀請的學科中，以 (d) 類型最為常見或被視為理想方向，亦有案例跨越或分散於其他類型。作為論壇，我們暫定此框架，供讀者在閱讀各學門的知識傳播實踐時參考，同時也建議將知識傳播行動與行動者置於各自的社會脈絡與目標中理解。

參考文獻

- 王宏仁 (2016)。〈社會學的公共書寫：以學術科普部落格為例〉，《台灣社會學刊》，59，1-27。
-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C. Emerson & M.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diou, A. (2007). *Being and event*. Continuum
- Buber, M. 1958. *I and Thou*, 2nd ed. Scribners
- Cetto, A. M. (Ed.) (2000). *W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A New Commitment*. UNESCO.
-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Penguin.
- Freire, P. (1974). *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Sheed & Ward.
- Fourez, G. (1997).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y as a Social Practi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7(6), 903-936.
- Holmes, A. J. (2022). Public Writing for Social Change. In D. L. Driscoll, Megan Heise, M. K. Stuart, And M. Vetter (Eds.), *Writing Spaces: Readings on Writing, Volume 4* (pp. 199-216). Parlor Press.
- McQuail, D. (201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6th ed.). Sage.
- Rogers, E. M. (1976).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213-240.
-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Free Press.
- Van Leeuwen, T. (2007).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1(1), 91-112.